

三次。濟瀾號船在那裏拆換羅盤，船員作「遇險離船」(abandon ship)的練習，而女賓(這是船員放在餐桌上用以規定座位的一張卡片上，對於我的名字之客寫法)則在這座小島的不毛火山頂上從事探查。吉斯加是個長約三十五哩，闊約六七哩，而又崎嶇荒涼的小島，在一九三六年時，除狐狸和海鷹外，別無居民，詎知現在竟與阿圖島大露其頭角。我當日會爬到高山頂上俯瞰那停泊在港內的濟瀾號船，就像水面上浮着一片小樹葉。想不到沒有多久，美國潛水艇竟在那波平浪靜的港內，把兩艘日本驅逐艦擊沉，又使另一艘日本驅逐艦燃燒甚

烈。從前有跟着俄國貿易家剛到「國際日期線」近旁的各灰色小島上來傳教的一位糊塗傳教師，他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宜稱準備星期日講道；到了第二天，人家告訴他這是星期一，他就驚慌得不知所措。一九四二年美國獨立節的那一天，吉斯加島上日本人竟遭到了美國水兵的這樣嚴重的打擊，我想他們的狼狽情形，當不亞於那位糊塗傳教師。

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本文原名 Aleutian Islands, 載英國 Contemporary Review, Sep. 1942.

論語文現象與社會關係

許傑

——並請教陳望道先生——

陳望道先生的論文法現象和社會關係(刊東方雜誌復刊號)，大體都是批評我的中國文法革新泛論(載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出版文理月刊第四五期合刊)那篇短文的。在大體上，陳先生也同意我的主張，祇不過說我的主張「未免近乎誇張」而已。我對於陳先生的意思，自然也很贊同，但所謂近乎誇張一點，卻也不能不有一個解釋。

文法學所研究的對象，是語文現象；文法學的研究，是要從語文現象中，抽繹出人類所用以發表思想交換思想的語文表現方法，再從語文表現方法中，歸納出語文表現規律來。所以，語文表現規律的探求，就是文法研究的任務。不過，一切的語文現象，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必定要通過他的社會契約關係，而後才能成立。而且，這一種社會契約關係，當他成立以後，便要成爲社會制約關係的。所以，一切的語文表現方法與語文表現規律都是建築在社會契約關係甚至社會制約關係上面的。

因此，文法研究的工作，收集並且記述一切的語文現象，和抽繹

並且歸納一切語文表現方法和表現規律，固然是第一步的必要的工夫，而說明一切的語文表現方法和語文表現規律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以及他與社會契約關係和社會制約關係的關係，卻是一件更加重要的工作。

現代的一切學術研究的發展的動向，都是先從記述的階段走向說明的階段的，對於文法研究，特別是提到國文法革新，主張建立中國文法新體系的學者們，似乎不應該忘記了這一步工作。

固然，企圖用社會契約關係來說明語文現象，語文表現方法，和語文表現規律，現在還是「新採」「初採」一類的工作，還未能和文法學一樣有歷史；但如果認爲這一種理論尚不無理由，而且有一部份語文現象，的確可以用社會關係來說明，那末，我們祇好認定他的歷史太短促，過去的勞績太缺乏，須得我們加緊的努力，與加深的探求；卻不可以因爲他的歷史太短促，勞績太差，便說是不應該努力或

而且企圖用社會關係來說明文法現象的工作，固然還未能和文法學一樣有歷史；但文法學本身的歷史也不能說是過於長久。比方說吧，一直到了現在，我們中國，便沒有一部中國文法史，也沒有一部中國文法學史。如果在現在，我們有一部完整的文法史，那末，我想，我們現在所要致力的工作便覺輕便得多了。譬如繁詞「是」字用法（見于方中國文法學初探附錄），助詞「之乎者也」的出現（見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雖然就是幾個字或幾個詞的問題，但經過學者一加考究，一加說明，而他的社會關係以及和人類文化發展各階段的關係，卻也不能不使人明確的信任着，而加洋加番加胡等語彙，則不過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望道先生說：「五四以來男女的差別比以前少得多了，而文法的現象卻就在那時出現了牠有別的習慣。」這話初初看來，倒頗像一個反面的證據，但在事實上，又何嘗不是因為女權的抬頭，以及受了外國語文的影響的緣故。這事情離現在不久，我們還能回想得到。如果我的記憶不差，這提出「他」「她」「牠」的規定的，恐怕還是正當望道先生主持民國日報覺悟欄的筆政的時候呢，而且，望道先生的大著「文章作法」(？)的後面，還有這一個附錄的吧！至於說到「身稱代語固然都已重複盡然，不相混淆，而名語卻至今還在『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單複無別的地」的問題，我以為這也不能算是語文現象與社會關係的隔絕的證明。有一次，方光蕪先生曾和我談起「們」字的升格問題。他說：「太太『們』，老爺『們』，如今已不成問題的了；小雞『們』，菊花『們』，也已經有人在試用着，而且我也看到過了；到了將來，恐怕石頭『們』，也要出來的吧！」光蕪先生的這些話，一半可以說是玩笑，但一半卻也很是認真。我們曉得，這一個「們」字，說文裏面是沒有的；集韻裏面雖有「們」字，但是讀作去聲，且不作表身稱多數意義解。而如今我們所用的「們」字，在元曲裏出現的時候，還祇是依音借字寫作「每」字，作「我每」「你每」的。直到近代，這「們」字的用法與意義才獲確定起來。從今以後，又安知「石頭們，戰馬們」的用法，不會出現呢？總之，語文現象在不斷的演變，語彙也在不斷的生成，那是毫無問題的。而這種演變及生成，當然也不會無因的吧！如果到那個時候，我們用集團意識的抬頭以及因近代人類思想軌範的漸趨周密，而影響到單複數的明確的區別等語去說明，想也不能算是勉強吧！

以上所說的，都是關於語彙方面的事。望道先生也說：「大抵最能說明的是語彙，語彙最能顯出各異的要求和關心，最能反映各異的意識和習慣，一有新智識，新事物發生，便能立時顯出變動。」這的確是不錯的話。但望道先生接着卻說：「所謂可以做人類發展上一切創造和進化的一切階段的證據，大體是語彙方面的舉，也是屬於語彙的，不是關乎文法的。」這卻未免使人懷疑。根據望道先生的意思，好像語彙是一回事，而文法又是一回事，語彙與文法，好像是兩不相涉似的。但是，文法研究的領域，原來就包括着「句論」和「詞論」兩部份。這一次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固然也曾主張廢棄從詞到句，採取從句到詞的研究，但對於語彙的研究的工作，卻不曾被人否定過。所謂「句本位的研究法」，所謂「詞序決定詞性」，都是沒有放棄了語彙的研究的。最近，我在「讀書通訊」上看見望道先生的「文法的研究」一文，知道望道先生對於文法研究，又有新的見解，第一，他給文法下了一個新的定義，說「文法就是組織字語為辭白的規律」，說「文法的研究就是辭白的組織的研究，也就是字語如何參加組織的研究。」第二，他把字語分析為聲音、形體、意義和功能四種因素，而後承認「功能」是語參加一定配置的能力，組織是由功能決定的語和語的配置；組織要受功能限制，功能要由參加組織機能顯現；「頗思以「功能中心說」獨樹一見。這些見解雖然也有些近於「表現的科學」，和「詞序決定詞性」的說法相似，但卻也是清新可喜的。

「組織要受功能的限制，功能要由參加組織才顯現，」這是很有意義的，對詞和句的有機的關係的最好的說明。以前所謂白話文的一字傳神的「吃不了」、「吃不得」、「吃不到」、「吃不着」、「吃不夠」、「吃不慣」、「吃不來」、「吃不完」、「吃不起」等例

120828
子，如果用機械的圖解的形式去說明，便不容易得到滿意的結論。但如果從組織與功能的有機的關係上去看，便覺得很有意思了。又如「人是理性的動物」一句，如果僅從機械的圖解入手，那末「人」是主詞，「是」是繫詞，「動物」是補詞，而「理性的」卻祇是附加詞。而附加詞不是句組的必要成分，是可有可無的，所以，這一句組的必要骨幹，便成爲「人是動物」。而「人是動物」一句，則非但在邏輯上不夠嚴密，而在意義上也有些近於玩笑了。

望道先生也說，一有新知識，新事物發生，文法也能顯出各異的習慣和意識的變動，但變動較難，對於社會的關係也不及語彙對於社會的關係簡捷分明；這自然是非常確切非常誠懇的說話。但這也祇是說文法現象，特別是語文表現方法和語文表現規律的變動，不及語彙的變動，和社會的關係顯得更形密切而已！而在骨子裏，卻還是不能否認文法現象和社會關係的關係的。

現代的語文，可以說不能截然的和過去的文言文分開的。例如：如下所引的這樣的文句，我們能夠在隨便那一本文言文的書上看到嗎？

「爲理想而奮鬥，理想的奮鬥——是使人類愈加分明自覺到自我的責任的，必不可缺的內在的鬪爭。反之，我們能夠想像到人們的每個步驟中，看見那和人的本能，很顯然地充分的發展着：他們講忍耐，他們不得罪任何人，他們從來不對什麼事負責任，反而想去安慰任何人，要對任何人說必須節欲知足，並且大約還裝這樣說吧，——大家相愛呀，云云，然而，究極來說，這是在尋求那死滅的，引導人類種族的力逐漸趨向追求死滅的，安適的，最孱弱的利己主義者。」

「社會的本能在未熟的理性審判前往往往像煞是非理性的：『虛榮罷了』，理性說：『死了還講什麼光榮呢？死了不是什麼都完了？』理性而且還會附加道：『吃罷，喝罷，作樂罷，』但到了厭倦了這些的時候，理性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於是人類就爲

本身的生活飽滿所吃驚。」（抄引齊明譯實證美學之基礎三十六、七頁）

在這兩段文章中，非但「像煞是」，「所吃驚」等新語彙剛從口語中提煉出來的，就像「爲理想而奮鬥，理想的奮鬥」這一種語組，可也不是中國過去的文法現象上所曾經見過的。至於「並且」，「大約」，「還要」，「這樣」，「說」，「的」，「罷」，從語彙上說，可並無一個是新奇的，但如今把他們連在一處，我們便覺得這種句法新奇，婉轉，在文言文中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同類的例子來。再說到全句的句組，這樣細密這樣曲折的句組，這樣爲以前所無的語文現象，除了外來的語文形式的影響，外來思想的影响，以及近代中國人的思想體系更趨嚴密等理由以外，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呢？

所以，用社會關係來解釋文法現象，應該不僅局限於語彙，就是句組，也是未能例外的。如今我們還感覺到文法的變異不及語彙的變異能夠更顯明的顯出和社會的關係來，那就祇能怪我們的工作還逗留在「初探」或「新探」的階段裏的緣故。

我以前在「泛論」當中說的「研究語文現象與語文法則的文法學，如果離開了社會關係，如果不從社會制約關係出發，結果是會徒勞無功的」的說話，現在心願接受望道先生的意見，認承有點近乎誇張；但我自己承認近乎誇張的例證，卻與望道先生所指出者不同。我如今的修正是文法研究的記述的階段的勞作，如果當作說明的階段的橋梁論，是並不徒勞的；但如果不肯把眼光移進一步，企圖從社會關係去說明文法現象，而卻始終逗留在記述的階段裏，卻仍舊是徒勞的。這一點意思，未知望道先生以爲對否？

末了，望道先生對我所指出的因誇張而失實的小小的實例，我得有個聲辯。我說：「中國文法革新的氣運，一面是由於抗戰文藝展開以後文藝上提出民族形式的要求，對於語文現象特別加以注意與研究所形成的。至於動詞與形容詞的分別的討論，倒不過是這氣運展開的契機而已。」望道先生說：「寫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者是我，我記得

寫的時候，並沒有看見誰提出民族形式的要求，以時問論，民族形式的討論是遠在我們開始討論文法革新之後。」對於這一個事實，我心願提供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的實例做參考。五四的發生，是在民國八年，但胡適之的文學改良芻議及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卻是在民六發表的。此其一。二、我們現在講白話運動史，講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大家都在五四時代前後的中國社會發展找根據，假定沒有這一種社會的適當的土壤，胡陳他們縱然是天人，也不能創造這一有歷史意義的

論 觸 景 生 情

許 羣

文學作品離不開時代性，離不開地域色彩，更離不開季節天時的自然變化。

一般說來，文人是多愁善感，寒來暑往，影響他的心情；朝雲落日，啓發他的幻想。我不是說凡屬佳作全是吟風弄月，不過春宵秋夕，的確能夠勾引文思。

任何一種作品，全不能消滅季節的分野，小說，戲劇，散文，詩詞歌賦都是如此。春日懷人，不期而然地寫出「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韋應物「寄李儋元錫」）。秋日送別，自能低徊往事地高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李頎「送魏萬之京」）。

寫小說更不能忽略時間的因素，林黛玉在春天寫成「葬花詞」，在秋天寫成「秋雨詞」；賈探春在秋天結成「海棠社」，王鳳姐在冬天吟出「一夜北風緊」。「西廂記」長亭送別，開始使用「碧雲天，紅葉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一曲「端正好」點破了秋深天氣。「牡丹亭」「遊園」的名句：「原

劃時代的運動的。所以，我在「泛論」上，開始就說到氣運，而卻把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的討論，當作一個「契機」。望道先生寫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時，固然還沒有誰提出民族形式的要求，但大眾語文學的提創，當更在前一些吧？作與，望道先生寫那篇文章時，心理上早就在有意無意間受了一種感召，也是說不一定。更何況民族形式的提出在中國語文演進的路上是緊接着大眾語文學大眾化文學的提倡的呢？

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則又活活畫出陽春烟景，讓每個人為之心醉神情。人的感情往往隨着時節的變化而發生着波動，「女子懷春，男子悲秋，」都在說明着感情流露的痕跡。的確，經過嚴冬苦寒，枯寂生涯，目觀草木萌動，萬卉爭榮，誰的精神也會為之一爽，志氣為之勃發。待到秋風颯颯，黃葉飄零，一股淒涼蕭瑟之念，忽然侵上心頭，使你發生歲月悠悠好景不常之感。在豆棚瓜架下，你不會搗成一篇「爐邊閒話」；在白雲壓廬，你很難想像著天西瓜的飄口。這並不是說冬天不能發生夏天的感覺，而是說紀實篇章絕對離不開寒煖的背景。沒有「殘照西風」，王漁洋寫不出「秋柳」名作；沒有「爽氣西山」，黃仲則想不到「九月衣裳」。節序喚起你的回憶，陰晴刺激你的情緒，花月惹你留戀，晨昏導引你的動止。

但是一般描寫春秋的作品，很夠得上汗牛充棟，描寫冬夏的作品，則相形而見細。像「仲夏衣之夢」（莎士比亞）那樣烟雲浩渺，像「答蘇武書」（李陵）那樣朔風凜冽的胡地風光，畢竟不能多見。